

白先勇作品的大陆传播与“经典化”过程

金传胜

(南京大学 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 白先勇凭借其独树一帜的创作面貌与文学成就,成为新时期最早进入大陆并逐步走向“经典化”的台湾作家。考察白先勇作品的“大陆之旅”可以发现,文学期刊与出版、学院研究与教育、文学评选活动与跨媒介改编等因素共同促进与推动了其作品在大陆的传播、流布与“经典化”过程。意识形态语境、商业意识、主流伦理观念等非文学因子也在不同层面、不同程度,以不同形式影响了白先勇小说的“经典化”路径。此外,作家的将门出身、频繁的媒体“曝光度”与“亲民之举”、新作的成功宣传等,都对白先勇作品的畅销及其华文经典作家的形象建构有所助力。

[关键词] 白先勇;大陆传播;经典化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6)05-0087-06

The Spreading and Canonization Process of Pai Hsien-yung's Works in Mainland China

JIN Chuansheng

(Center for Research of Chinese New Literatur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With his exceptional literary features and achievements, Pai Hsien-yung was the first Taiwan writer accepted and canonized in mainland China. By observing the “mainland tour” of Pai’s works, it can be found that, literary journals and publishing, literary research and education, literary contest and cross-media adaptation jointly promoted the spreading and canonization process of his works in mainland China. Non-literary factors such as ideology context, business consciousness and mainstream ethics affect its canonization process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degrees, and forms. In addition, Pai’s noble birth, frequent media “exposure” and interaction with audiences and successful promotion of new works also benefit Pai’s well-selling and his status as a Chinese classical writer.

Key words: Pai Hsien-yung; spreading in mainland China; canonization

由于当代文学正处于“现在进行时”,任何盖棺论定似乎都显得为时过早,对于经典的讨论也总是会引发质疑与论辩。“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作为还进行着的、我们可以参与其间的历史时空,也许对于经典建构过程的阐释比结论性的何谓经典的判语更为重要。”^[1]在此意义上,经典标准的阐释也许各执一词,但文本在具体语境中的经典认证过程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生成机制则可以分辨、厘清。与大陆文学相比,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化”

问题显得更为复杂。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与文化氛围,大陆和台湾两地的文学曾隔绝数十年,直至新时期后,两岸文学的互动与交往才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态势,既促进了同胞之间的交流与联系,又共同将华文文学推上世界文学的广大舞台,参与到文学的“全球化”进程中。

白先勇是新时期最早进入大陆读者与研究视野的台湾作家,新世纪后则因推广昆曲和出版其父白崇禧相关图书而频频成为文化热点。可以说,

白先勇已经成为最为大陆读者和媒体熟知的台湾作家之一。他的文学作品和文化活动,对两岸文学、文化的交流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中国文化的海外推广的贡献亦有目共睹。本文选取白先勇为个案,在承认作家杰出文学成就的前提下,考察其作品(以小说为主)在大陆的传播、流布与“经典化”之路,一方面试图发现华文文学跨区域(不涉及跨文化)传播与接受过程中的一些规律,另一方面希望通过这一“抽样分析”,为整个“华文共同体”实现文学对话、共享文学食粮提供一些启示与反思。

一 文学期刊、出版与文学研究、教育

文学期刊是现代文学的重要传播渠道,在影视网络等新型传媒兴盛之前,更是文学作品被读者关注、阅读和接受的关键载体。白先勇的文学作品在大陆的传播即以纸质刊物为其先导。1979年6月,白先勇的短篇小说《永远的尹雪艳》在《当代》创刊号上刊发。由于《当代》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一国家级文学出版机构创办,地处首都这一政治、文化中心,加之作家身份的敏感性(国民党大将白崇禧之子)、作品自身审美价值的高度,引起了海内外读者、批评家和作家的广泛关注,而最大的影响则在编辑出版界。白先勇在《当代》上的“亮相”,“好像产生了某种‘风向标’作用,使编辑出版界对台港澳文学和海外华文作品有了一种更客观、更理性、更宽容、更亲和、更开放的态度,因而有关的刊物和出版物随之多了起来”^[2]。白先勇的小说仿佛报春鸟最初的啼鸣,宣告了台湾文学“回归”大陆的破冰之旅,更开启了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在大陆广泛传播的序幕。白先勇文学作品在大陆的流布、传播由此稳步推进,通过多种媒介载体持续不断地升温,逐步地走向“经典化”。

紧接在《当代》之后,1979年第5期的《收获》刊载了白先勇的《游园惊梦》,《作品》第9期刊登了短篇小说《思旧赋》。进入80年代,大量文学期刊创刊,读者对文学的热情不减,对台湾文学也从先前的陌生走向熟悉、亲切。《海峡》《福建文学》《台港文学选刊》《海内外文学》《华文文学》等众多刊物都曾登载白先勇的作品,以短篇小说为主,偶有散文。其中1988年第4期《小说选刊》还选载了《谪仙记》(原载《文汇月刊》1988年第1期)。

文学期刊对白先勇的“发现”,进一步引发了大

陆出版机构对白先勇作品的青睐。1980年9月,广西人民出版社首先出版了由王晋民编选的《白先勇小说选》。此后,福建人民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等出版机构也相继出版了多种白先勇短篇小说的选集,岭南美术出版社还曾推出《花桥荣记》的连环画图书。以短篇小说集《台北人》为例,从1985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首次在大陆出版以来,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作家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花城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都曾推出,再版多达9次。再如白先勇迄今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孽子》,1987年由北方文艺出版社首次推出,编选者即莫言作品的主要英译者、“英文世界地位最高的中国文学翻译家”^[3]——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先生(Howard Goldblatt)。近一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再版。90年代至新世纪,上海文艺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花城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重庆出版社等又先后刊行。其他各种选录白先勇小说与散文作品的纸质媒介与图书更是难以计数。值得一提的是,2000年,花城出版社推出了《白先勇文集》,2009年再版。这是大陆目前搜罗白先勇文学作品较为全面、完整的一套集子,共分5卷,收录小说、散文、论文、戏剧、电影脚本、访问、对谈等不同文体。2004年,白先勇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首次合作,推出了《姹紫嫣红牡丹亭》,此后该出版社又出版了《台北人》《纽约客》《孽子》《寂寞的十七岁》《树犹如此》《白崇禧将军身影集》《关键十六天: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白先勇、廖彦博合著)。这一“理想国·白先勇作品”系列丛书初具作家全集的面貌,以精美的装帧与较高的印刷质量在读者中深受好评。如果排除琼瑶、古龙等在大陆畅销的台湾通俗作家仅就严肃文学而论,白先勇作品的大陆出版量遥遥领先,且保持着有增无减的良好势头,几乎可谓形成了白先勇相关图书的“出版热”。“从本质上说,出版作为一种文化媒介,它对当代台湾经典性小说价值在祖国大陆传播与接受的深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4]

学术研究成果为文学教育提供了教学资源,而文学教育也促使普通读者向专业研究者的转化,两者合力促动文学的社会传播与经典构建。在大学、研究所等学院机构中开展的文学研究与教育,是树立作家及其作品“典范性”地位的重要推手。一方面研究者以专业批评家的身份对文学作品进行阐释,另一方面文学“正典”的形成也为研究者树立了

话语权威与学术地位。白先勇在大陆的传播与新时期“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这一学科的蓬勃发展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许多高校设立了与台湾文学或海外华文文学相关的研究机构,一批从事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与教学工作的人员,对白先勇文学作品的大陆流布、传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袁良骏、刘俊等学者,都在白先勇研究领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在大陆以外亦有学术影响力。

时至今日,大陆学界出版了两本白先勇传记(王玲玲、徐浮明《最后的贵族:白先勇传》、刘俊《情与美:白先勇传》)与三本研究专著(袁良骏《白先勇小说艺术论》、刘俊《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尤作勇《“现代文学”的歧路:白先勇、陈若曦小说创作比较研究》),举办了两次大型的学术会议(分别是2000年汕头大学举办的“白先勇创作国际研讨会”、201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白先勇先生的文学与文化实践暨两岸艺文合作学术研讨会”)。通过检索中国知网的学术资源总库,初步统计,从1979年到2015年,大陆地区公开发表的有关白先勇研究的期刊论文近500篇,而以白先勇作品(包括翻译研究)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硕士论文超过100篇。鉴于已有两篇研究综述(刘俊《白先勇研究在大陆:1979—2000》、毛泳洁《白先勇小说研究在大陆:2001—2011》),本文不再进行赘述。大量学术论著的出现,无疑说明了研究者与批评家对于白先勇的持续追踪与阅读热情。

文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文学史的编撰,文学史著对于作家作品所进行的筛选、评价、阐释、解读,显示了在主流意识形态、审美风尚与著者文学观念的共同规约下,文学“经典化”之路中的多重面向。随着大陆“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学科的发展,有关台湾文学或海外华文文学的文学史教材或论著应运而生,许多史著都视白先勇为台湾文学和美国华文文学的重要作家之一。如《现代台湾文学史》(白少帆等主编)、《简明台湾文学史》(古继堂主编)特辟专章介绍白先勇,其他如《海外华文文学史》(陈贤茂主编)、《20世纪台湾文学史略》(陆卓宁主编)、《台湾文学史》(刘登翰等主编)、《当代台港文学概论》(古远清)、《台港澳文学教程新编》(曹惠民主编)等,都以专节的篇幅对白先勇创作进行了论述。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编写中,开始注意对港澳台文学进行整

合,台湾文学成为整个现代文学史论述的重要版块。当前在高校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比较通行的本科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朱栋霖等主编)在下卷的港台文学部分,即专节介绍了白先勇、陈映真、黄春明三位小说家;配套的作品选中,选入了白氏的《游园惊梦》。另外,《永远的尹雪艳》等被一些高中语文选修课教科书选入。文学教育因其受众广泛,强制性地培养了文学的读者,从而间接对文学生产、流通与消费发生作用。学院体制内的文学研究与教育原本就是以建构、传承、推广文学“经典”为其分内之职,依托于学科建设,影响力则以学术圈为中心向全社会辐射,从而积极地推进了白先勇文学在大陆的接受与“经典化”过程。

二 文学评选与文学的跨媒介转化

早在1999年3月,白先勇的《台北人》就曾入选台湾《联合报》“联合副刊”评选出的30本“台湾文学经典”,不过该活动对大陆影响甚微。1999年6月,香港《亚洲周刊》仿效西方的“20世纪百大英文小说”而举行“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的评选活动。杂志编辑部事先列出500多本参考名单,然后邀请海内外的14名评委投票选出一百强,短篇小说集可以与长篇小说一同参选。投票历时半年,最后,白先勇的《台北人》排在鲁迅、沈从文、老舍、张爱玲、钱钟书和茅盾的作品之后,位居第7位,是上榜的前10名小说(集)中唯一一部当代作品。虽然《亚洲周刊》位于香港,但该文学“排行榜”在华人文学圈影响不小,大陆多家报纸与门户网站都进行了报导,结果也经常被文学研究者援引。这一“旨在总结全球华人的写作与阅读经验”的文学评选活动,是对20世纪华文文学的一次回望、检视与评估。同年8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北京图书大厦联手邀请专家学者参与评选的“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的最终结果中,白先勇的《台北人》赫然在目。以上两次评选活动的开展,以权威专家观点为导向,影响面较大,无形中推动了筛选、认证经典中文小说的过程。白先勇《台北人》的成功入选,并不是一次偶然,说明在全球华人文化圈中已树立了其作为华文文学经典著作的地位。

如果说“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的评选是由作为精英的权威专家所认证,进入新世纪后,借助网络这一新型媒介,新的文学评选开始强调读者意

识,赋予了广大网民以重构当代文学经典的参与权。其中2005年由新浪网读书频道、北京燕山出版社联袂推出的“华文世纪文学60家”评选活动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次评选由北京燕山出版社牵头,由白烨、倪培耕、陈骏涛、贺绍俊为总策划,先确定了100位作家及其代表作作为候选名单,然后邀请国内现当代文学学科的25位知名专家组成评选委员会,在100位候选人名单的基础上进行书面投票,以得票多少为序,产生专家评选结果。为了“既体现文学专家的学术见识,又吸纳文学读者的有益意见”,主办方采取了专家评选与读者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在新浪读书频道上展开了为期两个月的“全民网络大评选”,评选结果于2005年12月16日揭晓。最后,取专家与读者打分的平均分排出“60家”的座次,以期“反映20世纪华文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形,体现文学研究专家的普遍共识和读者对20世纪华文文学作品的阅读取向”。在最终的“排行榜”中,白先勇紧跟在余光中之后位于36位。不可否认,这次活动掺杂了文学出版机构的商业策划与操作意识,打造出的文学“经典”直接为系列图书的后续出版带来了某种“品牌效应”和经济利益。这次评比,因为设置了网民“公投”环节,显示了当代文学的“经典化”生成机制已不再由专家完全主导,借助网络电子媒体,普通读者的评价意见也开始渗透其中。

杰出的文学作品总是会受到导演的格外垂青,被转化、改编为其他艺术形式。优秀作品尤其是叙事文学,可以为影视剧提供出色的文学剧本,保证影视作品的质量,并提高观众的文学品味,而改编成功、票房叫座又叫好的影视作品反过来又能普及案头文学,增加原著与作家的声名。早在1984年,台湾导演张毅、白景瑞就分别根据《玉卿嫂》《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执导了同名电影,但限于客观原因无法与大陆观众见面。1989年,大陆著名导演谢晋根据《谪仙记》拍摄了电影《最后的贵族》,放映后反响很大。其实谢晋最初的打算是改编《花桥荣记》,但由于当时海峡两岸关系尚未缓和,无法前往台湾取景拍摄,于是只好放弃而另选《谪仙记》。不过,父亲留下的遗憾,十年之后却在儿子谢衍手中得到弥补。1997年底,谢衍改编自同名小说的电影《花桥荣记》在台湾、大陆公映,颇受业界好评,曾入围第35届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

2006年,改编自小说《玉卿嫂》的同名大陆电

视剧上映。2009年,改编自《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的电视剧《金大班》播出。虽然它们反响一般,但电视剧的高度覆盖面与大众性,对于小说原著的宣传效应是显著的。除了电影、电视剧,大陆还将白先勇的许多小说搬上了戏剧舞台。1988年、2011年,舞台剧《游园惊梦》两度在大陆上演;2005年,话剧《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在京沪两地演出;2013年,《永远的尹雪艳》被改编成沪语话剧。此外,上海越剧院于2006年将《玉卿嫂》改编成大型越剧,大获成功。文学与影视、戏剧的“联姻”与合作,对原著无疑是一种宣传,既扩大了作家与作品的影响力,又能促使、吸引电影观众成为文学读者,在影像表达之外直接捕捉来自语言文字的审美意蕴。不难发现,新世纪以降大陆对白先勇小说的改编热情持续高涨,且不同艺术形式的改编容易出现“跟风”现象,《玉卿嫂》《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等产生了数个改编“版本”。作家描写交际花或身世曲折的女性的故事,因暗合大众文化的娱乐性、消费性,往往成为改编者的首选。白先勇作品在大陆被改编成多种艺术形式搬上舞台和银幕,首先说明了读者对白氏小说的喜爱、赞誉与肯定,其次又扩展了其作品在大陆的受众范围,为白氏小说特别是《台北人》走向“经典化”的历程提供了一个侧面例证。

三 其它影响因素的助力或干扰

除了通过期刊、出版与影视等媒介,以及文学评选、文学教育等因素,白先勇广被大陆普通民众所熟知,还有其他不可忽视的因素。其中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因素,白氏作为作家与昆曲活动家的讲学、新书推介等活动,对于其作品的传播与日益“经典化”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台湾与大陆的长期分离与对峙,是20世纪国内战争的历史产物,在很长一段时间双方都在冷战思维的影响下互相敌视。1979年后,虽然以白先勇为代表的台湾文学开始了“大陆之旅”,但意识形态因素依然对台湾文学的传播有所制约。《台北人》中因为塑造了众多根在大陆的“台北人”形象,他们挥之不去的“大陆情结”很自然地大陆论者视作一种“怀国”“思乡”的情感,一种对故土与祖国的“怀乡病”。据此,在大陆早期研究白先勇的论著中,普遍都会强调白先勇的爱国主义立场和爱国作家的身份。如王晋民认为白先勇描写了台湾人民和旅美华人的“乡愁”,“实际上是爱国主义思想的

一种曲折的表现,是深沉的民族感情的反映,也是白先勇作品的一种可贵的素质”^[5]。井继成在《略论台湾小说中的爱国主义精神》(1983)一文中写道:“白先勇的小说,坚持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在暴露台湾社会黑暗现实的同时,抒写了台湾同胞和海外华人怀国思乡的真实情感,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6]这样的论述显示了早期研究者对于白先勇现代主义手法的隔膜,也隐隐可以窥见盘踞在文学批评话语中的“后冷战”思维。由此可见,爱国立场是大陆学者接受、评价、推崇白先勇小说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阐释维度。即使在强调文学“去政治化”的当下,“政治正确性”依然是白先勇作品得以在大陆出版、刊行、流传的潜在保障。

新时期以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大陆与台湾结束了数十年的政治、文化隔绝状态,两岸作家的互访与交流变成了可能,这些活动的开展,为台湾文学的大陆流播带来了新的契机。1987年,离开大陆38年的白先勇,首次归访祖国大陆,应邀到广州、上海等地参观讲学。与老朋友谢晋的会面,最终敲定了两人的合作,催生了电影《最后的贵族》。上海的《文汇报》于次年第1期将白先勇作为封面人物,刊登了他与谢晋关于这部电影的对话录《未来银幕上的“谪仙”》、小说《谪仙记》和散文《惊变——上海漫记》。正是这次旅程,白先勇得以欣赏了久违的昆曲,由此开始了与昆曲的不解之缘——通过重排《牡丹亭》等剧目,不遗余力地推动昆曲艺术的传承与复兴。自然,“昆曲义工”的身份让白先勇在文学领域之外具有了知名度,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对昆曲艺术的推广与宣传大获成功的背后,一方面契合了国内重新提倡传统文化与“国学热”的潮流,另一方面则缘于其作为知名作家的影响力与号召力。新世纪以来,白先勇频繁奔走于两岸三地,他的足迹踏遍了祖国的各大城市,携着“青春版”《牡丹亭》走进了许多高等学府。2004年5月,白先勇来到桂林出席其自选集《青春念想》和剧本《牡丹亭》的首发式。2006年12月,《圆梦——白先勇与青春版〈牡丹亭〉》在大陆举行首发式。2012年4月,白先勇花费多年心血编著的图文集《白崇禧将军身影集》在北京举行了新书首发式。2015年,白氏又携新作《关键十六天: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到北京、上海等地演讲,并于南京大学设立了“白先勇文化基金”。每本新书面世后,白先勇都积极配合出版社奔赴各地进行宣传,或到大学或

在书店讲演、签售,并接受媒体访谈,与广大读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互动。这些“亲民之举”拉进了作家与读者的距离,也扩大了其作品的深度传播。

《台北人》作为白先勇的代表作,其在大陆的传布与“经典化”的过程似乎无甚悬念、水到渠成,但是作者另一部长篇小说《孽子》就显得命运多舛。小说问世之初,因为其同性恋题材的特殊性,台湾评论界保持沉默,反应冷淡,有人私下批评小说,认为它违背了社会伦理道德。白先勇后来回忆道:“二十年前《孽子》出版后,那时候台湾社会好像不知如何对待这本‘怪书’,先是一阵沉默,后来虽然有些零星的言论,但也没能真正讲中题意。要等到九十年代,有关《孽子》的评论才渐多起来。”^[7]

大陆于1987年首次引进出版后,陆续出现了一系列评论文章。石明的《父亲呵,父亲!——评白先勇长篇小说〈孽子〉》、袁良骏的《白先勇长篇小说〈孽子〉论辩》是较早肯定《孽子》创作成就的文章,尽管两位论者也提出小说存在一些缺陷,但批评的着眼点都是在叙事艺术层面,可谓言之有据。而陈学兰《“青春鸟”飞向哪里——小议〈孽子〉思想得失》一文则从保守的道德伦理观出发,将同性恋径称为“性变态人物”“性倒错者”“畸形恋者”。《孽子》被解读成“从另一侧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病态的又一次重要的摄象”,其重大的认识价值正在于“深刻地揭露了台湾社会繁荣下掩盖着的黑暗腐朽”。正因为对同性恋现象持否定、鄙视态度,论者认为白先勇对同性恋恋情有美化、渲染的“嫌疑”,在思想倾向上存在偏颇与局限,即“在反映生活时达到了客观的真实,在解释生活时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的泥潭”。^[8]这样带有偏见的观点在当时绝非孤立,如安兴本在《缺失的悲歌与难鸣的梦魇——台湾当代同性恋文学论》中不但视同性恋为“可耻之事”,而且竟同意艾滋病是对同性恋的天谴!到了新世纪,虽然2001年颁发的《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将同(双)性恋从精神疾病条目中删除,意味着同性恋已被官方去病理化,但现实生活中,同性恋仍被某些人视作“病态”,“恐同”心理与文化依然大有市场。而且,同志题材的影视作品往往无法得到公映,只能通过地下(盗版)或网络传播。如此文化语境必然波及《孽子》的传播、接受,相较于台湾掀起的数波“孽子热”,大陆对《孽子》的接受则显得更为平淡。由台湾制作的同名舞台剧能否最终“登陆”内

地依然是个未知数。可以说,与《台北人》已无法质疑的经典文本身份相比,《孽子》的“经典性”尚具有不确定性,依然在构塑之中。2011年,重庆出版社出版这部小说时以“华文世界最经典的同性恋小说”作为宣传语,在传达商业意识的同时似乎也框定了读者的期待视野,引出了一些有趣的议题:当“经典”需要标签化的修饰语(如同性恋、女性主义)来限时,是否意味着存在着不同类型的“经典”?当从预设的视角进入文本,“经典”本身所内蕴的丰富性是否被遮蔽?

白先勇凭借其独树一帜的创作面貌与文学成就,成为台湾文学“回归”大陆语境的领头雁、排头兵。这一“回归”之旅中,文学期刊充当了白氏的“发现者”,文学出版则紧随其后;学院体制内的专家批评与文学教育则依托学科建设,以学术圈为中心,向全社会辐射状发挥影响力,积极推动白先勇文学的大陆流传、接受与“经典化”构建;大型文学评选活动所推出的文学“排行榜”,为作家作品的社会传播与树立“品牌”鼓吹造势,并直接为相关图书的出版带来市场利益;频繁的艺术改编中,文字向影视、戏剧等的跨媒介转化,为白先勇小说发挥了正面的宣传效应,扩大了其作品在大陆的受众面。

综而言之,白先勇作品得以在大陆广泛、深入地流传、播布,得益于多种因素的共同“合力”。虽然本文并不涉及对白先勇文学成就的具体阐释,但文学期刊与文学出版、专家批评与文学教育、文学评选活动、跨媒介改编等之所以稳步推进,主要是作品本身艺术魅力与审美价值瑜光难掩、华彩自绽的结果。当然,文艺之外的其他因素也在不同层

面、不同程度,以不同形式影响了白先勇小说的“经典化”路径:意识形态因素为《台北人》《纽约客》等作品的顺利流通“保驾护航”,商业意识在文学“排行榜”与图书“出版热”中幽灵般出没,主流伦理观念则影响了《孽子》的接受;作家显赫的将门出身、频繁的媒体“曝光度”与“亲民之举”、新作的不断上市与成功宣传等,都对白先勇作品的热销及其华文经典作家的形象塑构有所助力。

参考文献:

- [1] 马兵. “公投”经典与新世纪新文学的典律构建问题: “华文世纪文学 60 家”为例[J]. 小说评论, 2013(1): 69.
- [2] 孟伟哉. 白先勇《永远的尹雪艳》刊出始末: 关于《当代》答博士生颜敏问[J]. 出版史料, 2007(4): 21.
- [3] 何元媛, 张冬梅. 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的历程分析[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2): 112.
- [4] 赵小琪. 当代台湾小说在祖国大陆对应性选辑传播形态[J]. 华文文学, 2009(4): 9.
- [5] 王晋民. 论白先勇的创作特色[J]. 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1(1): 45.
- [6] 井继成. 略论台湾小说中的爱国主义精神[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83(1): 60-61.
- [7] 计红芳.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同性恋小说的沉浮: 白先勇小说《孽子》原因探析[J].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12(2): 69.
- [8] 陈学兰. “青春鸟”飞向哪里: 小议《孽子》思想得失[J]. 固原师专学报, 1991(11): 42.

责任编辑: 黄声波